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简史》上，记载着这样一段历史：1964年8月，中央作出了在三线地区开展以战备为中心大规模建设工业、交通、国防、科技设施的重大战略决策。新中国建设史上著名的三线建设拉开帷幕。在三线建设中，成昆铁路是重中之重。成昆铁路简称“成昆线”，北起四川成都，南抵云南昆明，是大西南的交通要道，中国铁路网主干线路之一。可以说，成昆铁路建设是西南三线建设的前提、命脉和关键。

成昆铁路全线贯穿西南地区地势险峻的高山峡谷，地形和地质极为复杂，线路所经之处有“露天地质博物馆”之称，全线有500多公里位于7度至9度高烈度地震区，其中通过8度和9度高烈度地震区的线路有200公里，铁路设计难度之大、工程之艰巨、施工之复杂，均前所未有，曾被外国专家断言为“铁路禁区”。1970年7月1日，1096公里（其中建筑里程为1083公里）的成昆铁路竣工通车，被联合国誉为“象征二十世纪人类征服自然的三大奇迹”之一。在中国高铁已经领跑世界的今天，我们更加难以忘怀那些付出青春、汗水、鲜血甚至生命的建设者。正是他们以血肉之躯、凭信念之力在筑路禁区谱写了新中国铁路建设史上的壮丽篇章。而这些奇迹的创造者都有一个引以为傲的相同名字，那就是成昆人；都有一种鼓舞人心、激发斗志的精神力量，那就是成昆人的精神。

成昆人：成昆铁路建设者的光荣称号

有一支队伍是成昆人，他们是经历过硝烟战场的“铁道兵”。铁道兵是一支诞生在解放战争东北战场上的英雄部队，不仅在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中建立了卓越功勋，更是新中国铁路建设的中坚力量。从新中国成立到并入铁道部集体转业，铁道兵为新中国修建了12000多公里铁路线，是同期新建铁路里程的三分之一，被誉为“铁路建筑的突击队”。1964年8月，毛泽东发出了“成昆铁路要快修”的号令。周恩来在总参谋长罗瑞卿提交的报告上批示：修成昆铁路，朱委员长提议，主席同意，使用铁道兵修。中央决定铁道兵参加修建成昆



□ 姜秀玉

铁路后，18万指战员秉承听党指挥的大局观念、令行禁止的组织纪律、敢打必胜的顽强作风、以苦为乐的乐观态度、勇争一流的进取意识，“汗水溶化千层岩，风枪打通万重山”。据统计数据显示，成昆铁路施工期间，铁道兵和筑路人员牺牲人数达2100多人，其中铁道兵牺牲1300多人。1978年7月，为纪念铁道兵成立30周年，叶剑英元帅郑重题词“逢山凿路，遇水架桥，铁道兵前无险阻；风餐露宿，沐雨栉风，铁道兵前无困难”，高度赞扬铁道兵的英雄气概。

有一支筑路大军是成昆人，他们是参加成昆铁路建设的铁路干部职工。成昆线除了铁道兵承建的667公里，其余均为铁路单位承担。铁道部组建了由铁道部第二、第四工程局，大桥工程局，电务工程总队和成都、昆明铁路局等单位干部职工组成的建设大军，与铁道兵一起组成了西南铁路大会战的主力军，不惜一切代价，艰苦奋斗，战胜了千难万险，成就了成昆铁路建设的伟大奇迹。

一批批勘测先锋是成昆人，他们是参加成昆铁路勘测设计的技术人员。成昆线地质复杂、地形险峻，不仅施工难度大，勘测设计任务也十分艰巨。来自全国铁路各设计院、科研单位、大专院校的数千名工程技术人员，对成昆铁路的修建进行了大规模的地勘、设计，他们坚持“上山到

顶，下沟到底”的勘测理念，冒着生命危险，在金沙江、雅砻江、大渡河、龙川江等江河大川间跋涉，在横断山脉、攀西大裂谷等崇山峻岭间穿行，用双手攀爬绝壁，用双脚丈量大地，历尽艰险，整理出工程标准与工程数量，为修建成昆铁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还有一批批“支铁”力量也是成昆人，他们是来自全国其他参建单位的建设者和支援成昆线建设的民兵、民工。成昆铁路的修建牵动着全国人民的心。为保证成昆铁路早日上马，全国各行各业、各部门，在人力、财力、物力上都给予了极大的支持和帮助。施工沿线成立支援铁路委员会（小组），主要领导深入到施工一线，切实抓好“支铁”工作。沿线动员了17万名农村青年加入施工队，支援铁路建设。在施工准备阶段，数以万计的各民族兄弟姐妹，沿着羊肠小道，翻山越岭，背柴送粮，搬运物资。在施工期间，按照“农忙务农，农闲修路”的要求，组织百万民众筑路堤、锤道碴、采片石、筛河沙。同时，动员沿线政府、学校为建设队伍住宿让房腾屋，设立商业、文化网点；动员菜农迁居到铁路工地附近种植蔬菜，千方百计确保后勤供应。筑路大军与沿线群众血浓于水、团结奋斗，留下了许多感人肺腑的生动故事。

成昆铁路建设对于改善西南地区

的交通状况、密切西南边疆与全国各地的联系、加强民族之间的团结、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完善国防体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时至今日，“成昆人”已经成为成昆铁路建设者共同的身份称谓，深深打上了他们曾经为之奋斗的激情燃烧岁月烙印，在新中国建设的历史长河中熠熠生辉。

成昆人的精神：用奋斗和牺牲凝炼的“铁路魂”

成昆铁路建设不仅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而且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这些精神内涵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听党话，跟党走。党中央作出三线建设战略决策，要求成昆铁路建设当好开路先锋，一声令下，30多万建设者齐聚大西南。近万名科研和工程技术人员全力攻关，几十万建设者共同奋战，党指向哪里，筑路大军就奔向哪里，不讲条件，不打折扣，哪里需要哪里去，哪里困难哪安家。我国著名数学家华罗庚教授考察西南铁路建设工地时，曾无比感慨地说：大家公认我是一个数学家，再难的数学问题我都解得出，但我无法计算出铁道兵战士对党和人民的忠诚。

人民铁路为人民。在成昆铁路大

会战中，筑路大军始终坚持人民铁路为人民的根本宗旨，在施工中采用桥梁代替高路堤的办法，尽量少占农田；采用立交桥涵跨越公路、米轨铁路、大车道、进水管道，尽可能减少铁路对当地交通、水利设施的干扰；选线时注意保护古镇，尊重少数民族文化遗产；把施工时使用的小型水电站留给地方，发展工农业生产；等等。成昆铁路使西南地区沿线2000万人的生活发生了巨大变化。

艰苦奋斗、无私奉献。千里铁路工地上，英勇的筑路大军在大渡河、金沙江滩上搭起草棚，在深山野谷里砌石垒灶，在高山顶上修起悬空的便桥。工地的公路便道没有修通，建设者们就肩挑人抬，水运马驮，把大批机械、材料搬到隧道口、大桥旁。大型机械搬不动，就把它们化整为零，拆成小部件，一件一件抬上人迹罕至的高山。他们把工地当战场，以简陋的工具逢山打洞、遇水搭桥，攻克了一个又一个难关，解决了一道又一道难题。

不怕牺牲、勇往直前。成昆铁路是一条铁道兵战士和筑路工人用鲜血和生命铸就的“英雄路”，沿线留下了1000多座纪念碑，20余处烈士陵园。几乎每一个站点，都有烈士纪念碑或烈士陵园。1966年8月发生的两次大洪水、泥石流，曾经吞噬了130多条鲜活的生命。有352名烈士长眠

在成昆线上海拔最高、跨度最长的隧道——沙木拉达隧道。在这条长达6383米的隧道施工中，平均每前进一公里，就有50多人献出宝贵的生命。即使流血牺牲，也阻挡不了筑路大军前进的步伐。成昆人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凿洞修路，一路高歌猛进。

求新务实、敢于争先。成昆铁路建设从一开始就非常重视采用和发明新技术新工艺，精心设计、精心施工。经过科研人员、工程技术人员与全体筑路人员的努力，实现了许多技术创新和突破，技术进步成果占到当时全国铁路的70%~80%，创造了18项中国第一，13项世界第一。1986年5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的首届全国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上，“在复杂地质、险峻山区修建成昆铁路新技术”荣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特等奖”。成昆铁路建设通过解决一系列世界性工程难题，为人类在险峻复杂的山区建设高标准的铁路创造了成功范例。

成昆铁路修建时，外国专家曾断言：成昆铁路“即使建成了，狂暴的大自然也必使它变成一堆废铁”。50多年过去了，成昆铁路依然保持着活力，焕发着勃勃生机，已经成为西南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动脉，大山深处人民群众追求美好生活的幸福线。

装点此关山，今朝更好看。成昆铁路是新中国人民创造的世界铁路建筑史上的重要文化遗产，也是中国铁路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起点。如今，我们在为拥有世界上最现代化的铁路网和最发达的高铁网而无比骄傲的同时，回首20世纪60年代的峥嵘岁月，更加叹服于成昆铁路建设者坚定的理想信念、深厚的爱国情怀、钢铁般的革命意志和无私奉献的牺牲精神。这是属于“成昆人”的特质，具有鲜明的时代价值。这种精神必将激励一代又一代建设者接续奋斗，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征程上，谱写新篇章，再创新辉煌！

（作者系铁道党校科研处处长、教授）



唐甄：务实的启蒙思想者

□ 何山石

“亡国之道有十”，就将“百官好利而无耻，国亡”列入其中，并且敏锐指出，“明君或蹈之，不必暴乱如桀纣者也”，意思就是贤能的君主，也有可能犯这样的错误。唐甄认为，官员贪污，危害大、隐蔽性强，为政者必须明察。

浸透于《潜书》中的民本观念，是唐甄思想最难能可贵的内容。唐甄的民本思想具有非常鲜明的特点，在《潜书》的开篇“辨儒”“宗孟”等篇中，唐甄就将自己的思想建于“儒者计功”这样的基石上，将儒家重事功、重实践的思想纳入自己的政治观点中。同时，唐甄将“儒者计功”的内涵，又具体化为孟子的重生民、养民人的思想，将孟子“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这种细腻的、实实在在的“养民”主张，植入自己的民本观念中。所以，唐甄的民本观念有着深厚的思想渊源。章太炎在《征信论上》一文中谈道：“两本孟子、孙卿。王守仁以降，唐甄等已开其题端，至戴氏遂光大之，……”认为唐甄的思想与王阳明、戴震等大儒一样，与孟子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并肯定了唐甄在王阳明之后的清初时期，对儒家思想的发展作出的开创性贡献。

唐甄对民本思想的推演，客观上对儒家传统治理思想起到了很大推进作用。这种推进最重要的体现就是“廉洁”。在《潜书》的“考功”等章节中论及官员考核时，唐甄反复强调官员廉洁与养民爱民之间的关系。唐甄说：“廉才之吏，不能救民之饥饿，犹乳母而无乳者也，是可谓之良吏乎？”这个比喻生动地说明，官吏廉洁的第一标准，就是能让老百姓“丰财”、能让民得“厚利”，而非“廉止于洁身”。唐甄更为看重的，是官员为民生谋福祉的能力，而不是简单的洁身自好，“廉而不能养民，其去贪吏几何？”唐甄系“蜀中唐门”后人，其十一世祖唐瑜曾是明成祖朱棣的授业恩师，而唐瑜的先祖唐介，在北宋神宗皇帝时任宰相。由于出身于世代业儒的家族，儒家的民本思想对唐甄的影响很深。唐甄本人只做过短期的县令，此后一直为民，几乎贫困一生。他看多了官场中沽名钓誉的假廉洁者，也更了解社会底层百姓的苦难，因此写出了“显名厚实归于己，幽忧隐痛伏于民”的言论，痛感为官要真为民是多么重要。

唐甄对廉洁的诠释，涉及很多治吏的具体举措。《潜书》一书，唐甄言及为政治理，主要是在两个方面展开，一为养民，一为治官。关于如何使整个官僚机构高效廉洁等方面的内容非常丰富。在“省官”一篇中，唐甄论及精简结构与官员廉洁大有关系：“官多，则禄不得不薄；禄薄，则侵上而虐下，为盗臣，为民贼。故养民之道，必以省官为先务焉。”他认为，官多禄薄，一定会使官员突破为官底线，为获私利而铤而走险，滥用公权，“贪如狼”之辈在官场中大量出现，是必然之事。所以，唐甄主张裁汰冗员，使整个官僚机构高效廉洁。在《潜书》的“任相”“卿牧”“省官”“用贤”等诸多篇目中，唐甄都论述了如何治理官吏、如何使官员廉洁，这是他“尚治”理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吏治廉洁的深入思考，也使唐甄对“贪”的理解比较深刻。例如，在“富民”篇中，唐甄说：“天下之大害莫如贪，盖千百于重赋焉。”一般情况下，对于暴征苛敛，人们视之为洪水猛兽，痛加挞伐。但对于官吏贪污的危害，则其痛感不如重赋来得深切。而唐甄则认为，天下最大的危害就是官吏贪污，“彼为吏者，星列于天下，日夜猎人之财。”官员到处都是，没日没夜贪盗民财，不动声色，名正言顺，何其可怕！所以，唐甄惊呼：“民之毒于贪吏者，无所逃于天地之间。”

将唐甄与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的治理思想进行比较，可以看出，唐甄更加注重从吏治廉洁的角度切入对治理的思考。在《潜书》的“权实”篇中，唐甄言：“以实则治，以文则不治。”其大意是强调为官理政，重在为民办实事，能将为办实事的措施、想法等落到实处。实，就是不做表面功夫，不玩花架子。唐甄重视实用、强调治理之道贵在实干的观点，都体现了他对社会发展认识的深度，具有较高的思想价值，至今仍留给后世诸多启发和思考。



从三味书屋到春晖中学

□ 刘大先

20世纪初的中国目睹了文学巨匠鲁迅的诞生，他和他的文学世界已经内化为我们日用而不知的文化生活的组成部分。我们几乎都读过他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和《故乡》。1919年，鲁迅回故乡绍兴搬家，后来写出了著名的《故乡》，成为现代乡土文学的滥觞。记忆里诗化的原乡与现实中被觊觎的家乡形成激烈的碰撞，让归乡者黯然神伤，在离去时想象一个未来理想的故乡：这已经沉淀为一个现代中国人稳固的情感结构，直至今下，依然如此。

我也正是基于此，认识了绍兴，认识了鲁迅少年时代生活过的地方。但我从未到过绍兴，数次机缘都因为种种不凑巧而错过。在《故乡》发表整整一百年以后，我终于来到了这里，放眼山水与城市，却完全没有当年鲁迅感受到的那种萧索破败。一百多年间天翻地覆，绍兴依然山明水秀，却在乌篷船、青瓜蔓、密布的溪水山间崛起了无数楼群、高速公路和工商科技企业。

但是，鲁迅的《故乡》是不朽的，经过他的书写，绍兴不再只是一个地理空间，也是一个文化场域；不仅仅是鲁迅、蔡元培、秋瑾、王阳明、贺知章、王羲之的故籍，更是一切现代中国人所有感受到田园牧歌共同体遭遇现代性变革的流散者的故乡。而鲁迅却从来没有留念与沉溺在怀旧的、温情脉脉的退行性乡愁之中，他有大魄力、有锐利的眼光，有开阔的胸襟，向往着“新的生活”，并为此踏路前行。今日所见，见证了先贤的理想、努力、奋斗之真实不虚，“走的人多了，也就成了路”。

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的鲁迅故里，如今连缀成一个完整的景区，建筑与道路修葺整饬，河流与桥梁翻新如旧，艳阳高照下，

游人如织。这是一个全新的文化创意产业区了。百草园中“碧绿的菜畦，光滑的石井栏”还在，但“高大的皂荚树，紫红的桑椹”却已经换成了几株楝树，菜畦上攀满了南瓜的藤蔓，快要到了收获的季节。可能还有蝉鸣，但我没有听到，也许被鼎沸的人声掩盖了。

穿过新盖的“越青堂”出门，道路依然，两边是热热闹闹的商店，不多久跨过一道石拱桥，就是三味书屋了。这个老私塾并无多少特别之处，无外乎课桌照片之类，有意思的是后门外壁上题了一首四言诗：“栽花一年，看花十日。珠璧春光，岂容轻失？彼伯兴师，景煞太烈。愿上绿章，飘霖屏绝。”落款是寿云巢，即鲁迅当年启蒙老师寿镜吾的父亲。这首诗是为旁边栽种的腊梅写的，但格局颇大，气度不凡，既有珍惜时间的勉励，又有呵护学子的爱心。

绍兴的文化实在是丰富，我下榻的绍兴饭店建筑群中就夹杂着一座历史学家范文澜的故居。范文澜是范仲淹后裔，所以中堂树“清白堂”三个字，正是范仲淹当年贬任越州知府时所立。范家后世以责己恕人、先忧后乐为家风，绍兴人文积淀可见一斑。中午我进去参观时，居然一个游客也没有，大体是因为周围的名人故居实在太多。此地宋以后名家辈出，近现代以来更是风流荟萃，不胜枚举，究其实，经世致用是表与用，重视文教是根与本。

令我印象最深的还是小越横山白马湖畔的春晖中学。该校前身是1908年本地乡贤陈春澜创办的春晖学堂，新文化运动兴起后，1919年，他又委托王佐、经亨颐续办中学，1922年招生开学。我在校史介绍中看到许多熟悉的名字：夏丏尊、丰子恺、匡

五生、朱自清、朱光潜、弘一法师、胡愈之……这些一时俊彦都曾在此任教、求学或居留。在这样一个偏僻山乡的中学能汇聚如此之多的高人贤达，实在令人惊叹。

现在的春晖中学在原址上扩建，有五百亩，早年的仰山楼、曲院、图书馆、短堂都悉数保留使用。这些老建筑最有特色的地方在于它们都通过游廊连缀在一起，典雅而方便。校园位于湖中洲上，绿水环绕，有石拱桥通往后山麓，那里曾经是教职员工的宿舍。校园里也有一口硕大的池塘，荷叶田田，晚风吹拂，绿树婆娑，让人不禁要羡慕这样的好环境。

从春晖中学出来，走一条田间小径，一边是湖水，荡漾的碧波上停歇着归泊的渔船，远处灯影下是影影绰绰的苍山；另一边则是山脚的稻田，稻穗甸甸，可能是晚稻，也快到收割的季节了。路灯下的小道显得静谧安详，柚子树舒展着茂密的枝叶。我忽然闻到一阵熟悉的味道，那是小时候在家乡田野中时常闻到的气味，焚烧野草的味道，瞬间就激起了一种乡愁。但是，我的乡愁其实也和鲁迅差不多的，只是感慨此地生态环境的良好，城乡之间没有形成鸿沟般的隔阂与差异。整个绍兴不止文化资源丰富，其支柱产业主要是纺织、印染等轻工业，乡土中国向城镇中国最早的转型也正是起源于东南沿海这一片。

从三味书屋到春晖中学，实际上是“老中国”迈向现代中国在教育上的缩影。由鲁迅那里就开始逐渐走出了之乎者也，走向了现代美育、数学与科技，才有了今日我所见的绍兴全新的风貌，也才有可能在重新回味《故乡》时泛起别样的乡愁。